



明中后期科举考试用书的出版

张献忠

〔摘要〕明代尤其是中后期,科举考试和出版业都特别发达。科举考试用书在出版结构中占有很大比重,市场上不仅充斥着首场八股文范本和写作技法类的图书,而且还有大量二、三场考试的范本和答题技巧的图书,这些图书大多数都是书坊刊刻,是纯粹的商业行为。科举考试用书的大量出版乃至泛滥削弱了官方对科举考试的绝对主导权,但是对促进商业出版的发展以及思想的多元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关键词〕科举考试用书;出版;影响

〔作者简介〕张献忠,1973年生,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天津 300071)。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198(2010)01-0127-07

明代尤其是中后期,出版业空前繁荣,图书的品种迅猛增加,不仅涉及传统的经史子集,而且包括各种题材的大众喜闻乐见的通俗文学作品以及各种实用类图书。其中,科举考试用书的出版是一个重要方面,这类图书不仅品种多,而且销量大,在整个图书市场中占有相当大的份额。但是,对于这样一种文化现象(实际上也是经济现象)至今没有系统的研究和论述,这不能不说是一大缺憾。笔者不揣浅陋,拟对明代科举考试用书的出版作一系统论述,以就教于方家。

一、科举考试用书的界定

明代尤其是中后期,由于科举考试日趋规范化和程式化,大部分读书人考试的目的性更加明确,于是乎不再潜心钻研经书大义,而是转向揣摩时文和答题技巧。本文所说的科举考试用书主要是指科举考试范文和作文技法之类的参考书,这类图书是以应试为明确导向的,具体包括以下几类:

(1)科举考试范文。既包括首场的八股文范文,又包括二场论、判、诏、诰、表,三场以及廷试经史时务策的范文,如《皇明历朝四书程墨同文录》、《皇明乡会试二三场程文选》等。这类图书与今天的各类历年高考试题汇编或高考模拟题相类似。

(2)作文技法和应试技巧类的图书。如《新镌诸名家前后场元部肄业精诀》该书“分元、亨、利、贞四部。元、亨二部皆述八股文作法;利部为‘分类摘题偶联’,并附诸家作八股文法。贞部则为‘作论要诀’及‘诏诰表统论’,作‘判’‘策’要诀”〔1〕。

(3)部分名人文集。如唐宋八大家特别是苏

轼的文集就受到士子们的欢迎。王世贞在《苏长公外纪序》中说:“今天下以四姓目文章大家,独苏公之作最为便爽,而其所撰论策之类,于时为最近,故操觚之士,鲜不习苏文者。”〔2〕明末的陈绍英也说:“当今以制义取士,学术事功,无所不备。而尤以疏宕犀利为夺目,故最便子瞻文。”〔3〕

除了上述三类外,还有些图书是综合性的,往往既有科举考试范文,又有作文和应试技巧。

二、明代科举考试类图书的出版

由于明代科举首场直接从四书五经中命题,二场和三场以及殿试虽然考查的是应试者的综合能力,不直接从四书五经中命题,但仍须以儒家思想为指导,也大都与四书五经有关,因此四书五经以及与之相关的研究性和阐释性著作是士子们的必读书;另外,第三场的经史时务策以及殿试的策论除了考查应试者的政治能力外,也考查其历史知识,所以《战国策》、《国语》、《史记》、《资治通鉴》以及其他历代的正史等也是士子们的必读书。明初,士子们也确实能够踏踏实实地钻研经史,但是到了明中后期,随着整个社会风气的变化,学风也受到很大影响,士子们大都不愿花精力去研习四书五经,而是专以揣摩时文为事。另外,随着科举考试日趋规范化和程式化,士子们只要熟读大量的范文就能应付考试。于是,一些有钱人家便延请擅长作八股文的名士从四书五经中选出一些题目,做成八股文,让子弟反复诵读,待考试时“以所记之文抄誊上卷”〔4〕,这种现象在当时称做“拟题”和“剿袭”。

精明的书商从“拟题”和“剿袭”中看到了商



机,于是他们聘请有声望的塾师从四书五经中选出一些题目,做成八股文,或者是选编成名举人、进士当年考试时所作文章,刊刻成册——这就是八股文范本,又称时文。时文的大规模刊刻和流通始于成化年间,以《京华日抄》的刊行为标志。明代杭州著名的藏书家郎瑛说:“成化以前,世无刻本时文,吾杭通判沈澄刊《京华日抄》一册,甚获重利;后闽省效之,渐至各省刊提学考卷也。”〔5〕《山西通志》也记载说成化年间“举业者多记《京华日抄》”〔6〕。《京华日抄》以及“提学考卷”的刊刻和流通引起了一些士大夫的恐慌。当时的山西闻喜县举人赵仲辉就“奏请禁绝”《京华日抄》〔7〕,弘治四年(1491)正月,时任南京国子监祭酒的谢铎就在给明孝宗的奏疏中说:“今之所谓科举者,虽可以得豪杰非常之士,而虚浮躁竞之习亦莫此为甚。今而不读《京华日抄》则读《主意》,不读《源流至论》则读《提纲》,甚者不知经史为何书。……臣愚乞敕提学等官,凡此《日抄》等书,其板在书坊者,必聚而焚之,以永绝其根柢。其书在民间者,必禁而绝之,以悉投于水火。”〔8〕谢铎焚烧和禁绝《京华日抄》等书的建议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弘治十一年正月,河南按察司副使车玺再次上奏要求焚毁《京华日抄》之类的图书,他上奏说:“祭酒谢铎尝奏革去《京华日抄》等书,诚有补于读书穷理,然令行未久而夙弊滋甚。《日抄》之书未去,又益之以《定规》、《模范》、《拔萃》、《文髓》、《文机》、《文衡》、《主意》之书,未革去又益之以《青钱》、《锦囊》、《存录》、《活套》、《选玉》、《贯义》纷纷杂出,由禁之未尽得其要也。乞敕福建提督学校官,亲诣书坊,搜得书版尽烧之,作数缴部,仍行两京国子监及天下提学、分巡、分守等官严加禁约,遇有贩卖此书并歇家各治以罪。若官不行禁约,坐以不奉诏令之罪。”〔9〕正德年间(1506—1521)时文类的图书仍在不断刊行,正德十年(1515)十二月南京礼科给事中徐文溥上疏说:“近时时文流布四方,书肆资之以贾利,士子假此以侥幸,宜加痛革。凡场屋文字句语雷同,即系窃盗,不许誊录;其书坊刊刻一应时文,悉宜烧毁,不得鬻贩。”〔10〕

从以上几个奏疏可以看出,《京华日抄》出版后,各种名目的同类书纷纷出版,至少有20余种。其中《源流至论》、《提纲》、《主意》、《文衡》、《文髓》等大都是南宋科举考试用书,由于天顺至弘治年间“晚宋文字盛行于时,如《论范》、《论学绳尺》之类,士子翕然宗之”〔11〕,因此这些图书在成化和弘治年间得以重版。

虽然在成化、弘治和正德年间就有很多时文类图书大规模刊行,但种类毕竟有限,而且大部分读书人仍然皓首穷经,潜心于《四书五经大全》和《性理大全》以及历代正史。嘉靖、隆庆年间,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整个科举考试类图书处于一种供销两旺的态势。嘉靖年间的李濂曾说:“比岁以来,书坊非举业不刊,市肆非举业不售,士子非举业不览。”〔12〕到万历年间时文的刊行已经达到高潮并持续至明末,这时的士子们“皆以书坊所刊时文竞相传诵,师弟朋友自为捷径,经传注疏不复假目”〔13〕。至万历末年,流行的时文刊本共有四种:“曰程墨,则三场主司及士子之文;曰房稿,则十八房进士平日之作;曰行卷,则举人平日之作;曰社稿,则诸生会课之作。”〔14〕程墨是指程文和墨卷。程文的刊刻始自洪武二十一年(1388),“自时厥后,永为定式”〔15〕。明前期,程文选录的都是已录取的优秀考生的文章,但由于考生在考场中所作之文没有充裕的时间润色,难免存在一些瑕疵,因此后来考官“往往假举子之名刊刻试官之作”〔16〕,于是时人“又分士子所作之文,别谓之墨卷”〔17〕。程墨本来是由官府刊刻以为士子提供范本,但后来书坊为最大限度地牟取利润,也纷纷以“程文”、“墨卷”和“程墨”之名刊刻了大量图书,如万历年间汤宾尹评选的《睡庵汤嘉宾先生评选历科乡会墨卷》、崇祯年间杨廷枢、钱禧辑评的《皇明历朝四书程墨同文录十五卷》都是书坊所刻。房稿和行卷分别是指进士和举人平日所作的八股文。明代以切磋八股技艺为目的文人结社十分盛行,文社成员的习作刊行后便被称为“社稿”。万历年间还出现了一大批时文选家,许多著名的文人甚至是当朝士大夫也加入了时文编选活动,如万历五年,冯具区“集籍中名士文,汇刻二百余篇,名《艺海元珠》”;万历十一年,冯具区为会试同考官,借此时机他将自己负责判阅的一房进士的答卷汇编,刻书《一房得士录》这也是京城刻此类书的开始。〔18〕文人士大夫的加入使书坊有了充足的稿源。不仅如此,由于这些编选者本身就是时文高手,他们不再满足于简单的编选工作,而是在编选的同时,还对列选的每篇文章进行点评,一方面藉此阐发自己的思想,但更重要的是为了满足士子的需求,使其加深对文章的理解,掌握作文技法。在每篇文章旁加点评性的文字,始自王世贞的次子王房仲刊刻的程墨《阅艺随录》。自此以后,这种带有点评的时文集日渐增多,其中万历年间主要有:《程文选》四卷(范应宾辑并评)、《续程文选》一卷(张榜辑并



9 771001 619003



评》万历二十二年刻本;《皇明四书文选》三集六卷,田大年辑、李尧民评,万历二十四年刻本;《汤若士先生点阅汤许二会元制义》十二卷,汤宾尹、许獬撰,汤显祖评;《睡庵汤嘉宾先生评选历科乡会墨卷》不分卷,汤宾尹评选,万历四十二年刻本;《新刻汤太史拟授科场题旨天香阁说》六卷,汤太耆、阴德昌等评,万历四十二年刻本;《举业要语》不分卷,王时跃撰;《猛虎斋时文选》不分卷。

万历年间,科举类图书的销量当比以前有大幅提高,其中销量最大的可能是倪元璐的行卷《星会楼稿》倪元璐的长子倪会鼎在其所著《倪文正公年谱》中说:“府君时(指万历三十七年——引者注)已有《星会楼稿》盛传国门市人因之贾利,摹印至三万余板,字漫灭重镌者再,行卷之广向所未有也。”^[19]其畅销程度由此可见,但可惜的是不知什么原因,《星会楼稿》没有流传下来。天启、崇祯年间,时文类图书的刊刻又呈现出了新的特点,一些文社开始有组织地进行时文编选活动,从而使书坊有了更为充足的稿源;书坊和文人士大夫以及各种形式的文社联系起来,二者形成了良性互动,书坊通过刊行他们的时文选集赚得了丰厚的利润,而时文编选者除了获得稿酬外,更重要的是藉此影响读书人,扩大自己的影响力,甚至影响当时的科举命题、判卷和录取工作。晚明文人结社的一个重要目的就在于切磋八股技艺,时人陆世仪就曾谈及文社与八股文及其评选的关系,他在《复社纪略》中说:“令甲以科目取人,而制义始重,士既重于其事,咸思厚自濯磨,以求副功令。因共尊师取友,互相砥砺,多者数十人,少者数人,谓之文社。即此以文会友,以友辅仁之遗则也。好修之士,以是为学问之地;驰骛之徒,亦以是为功名之门,所从来久矣。”^[20]当时的文社多达数十甚至上百个,其中著名的文社有燕台社、应社、几社、豫章社、端社、读书社、匡社、毫社、鉴湖社等,崇祯二年,张溥等人联合全国各地的文社,成立了复社。复社成员多达2200多人,声势遍及海内。以时文为纽带的书坊和文人及其社团之间的互动催生出了一大批时文选家,著名的有金正希、艾南英、陈际泰、章世纯、罗万藻、张溥、陈子龙,他们频繁地组织各种征文和评点活动,反过来又进一步推动和壮大了时文类图书的出版。金正希“工举子业,名倾一时”^[21],他出版有时文集《金正希稿》(不分卷),另外,《金正希先生文集辑略》(九卷)中很大一部分也是时文;豫章社的领袖艾南英先后选编刊刻了《明文定》、《明文待》、《增补文定待》、《前历试卷》、《戊辰房书删

定》等八股文选本,他还编选与他齐名的陈际泰、章士纯、罗万藻和他自己的文章,“录其合于法与道者,而又摘其谬者”,取名《四家合作摘谬》刊行;复社的杨廷枢、钱禧编辑评点的《皇明历朝四书程墨同文录》(十五卷,二十四册),由建阳书坊叶氏刊行。文社通过各种征文活动,更是出版了大量的时文选本,如几社于崇祯五年(1632)征集了这一年其成员所写的八股文章,编成《壬申文选》(二十卷)由小樊堂刊行;崇祯三年,几社开始以《几社会义》为书名选刻社员的八股文,到崇祯十四年,共刊行了五集;复社成立后,接连举行了三次大会,每次大会的一项主要活动就是征集八股文,参加者以江南士子为主,但也有河南等北方省区的士子,甚至“秦、晋、广、闽,多有以文邮致者”^[22]复社将征集来的八股文汇作《国表》刊行,先后共刊行了六集。《国表》“按目计之,得七百余人,……计文二千五百余首,……嗣后名魁鼎甲多出其(指复社——引者注)中,艺文俱斐然可观;经生家莫不尚之。金阊书贾由之致富云”^[23]。《国表》的畅销程度由此可见。《几社会义》早在崇祯三年前就刊刻过,但最初影响远不如《国表》大,然而当几社的主要成员陈子龙、彭宾乡试同榜中举后,几社名声大振,《几社会义》也开始畅销。据几社创始人杜麟征之子杜登春写的《社事始末》载:“《国表》初刻已尽合海内名流,其书盛行,戊辰之房稿莫之与媲。《几社会义》尘封坊间,未能大显。至庚午榜发,卧子、燕又两先生并雋,而江右、福建、湖广三省贾人,以重资请翻刻矣。”^[24]三省书商“以重资请翻刻”一方面反映了《几社会义》的畅销程度,同时也反映了文社和书商之间的互利互惠的良性互动。在征文活动中,有的文社还有专门负责邮寄者,复社就是如此:“当天如之选《国表》也,湖州孙孟朴(淳)实司邮置,往来传送,寒暑无间;凡天如、介生游踪所及,淳每为前导,一时有孙铺司之目。”^[25]由此可见复社对征文活动的重视。

有了八股文范本,士子们“惟知此物可以取科名,享富贵,……而他书一概不观”^[26]。但是,在当时来说绝大多数时文类图书仅仅是作为科举考试的敲门砖,根本没有学术和收藏价值,也不像戏曲、小说一样可读性强,具有欣赏价值和消遣娱乐作用,中举或中进士之后就被人唾弃了。因此,这类图书流传至今的极少,我们无从知晓和估计具体的数量。但是,这类图书是当时绝大多数书坊的主打品种则是确凿无疑的,这一点不仅反映在以上的论述中,而且也反映在明人的文集笔记中。例如,



时人李诩也说:“余少时学举子业,并无刊本窗稿……今满目皆坊刻矣。”〔27〕徐元懋亦曾直言不讳地指出:“明刻非程文类书,则士不读,而市不鬻。”〔28〕王祖嫡也批评当时的读书人“皆以书坊所刊时文竞相传诵,师弟朋友自为捷径,经传注疏不复假目”〔29〕。由明人的这些论述可知,明中后期,以八股文为主的科举考试类图书处于一种供销两旺的活跃状态。

明代科举考试范文的出版除了各种八股文选集及其评点外,专门针对二三场考试的范文也特别多。根据当时的各种藏书书目和今人骆兆平编著的《新编天一阁书目》(中华书局 1996年 7月版)、雷梦辰编的《清代各省禁毁书考》(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89年 5月版)以及国内各大图书馆的善本书目等资料,明中后期出版的这类图书有近百种,兹不赘述。

正德、嘉靖年间,文坛上兴起了一股复古主义运动,这也影响了当时的科举考试,甚至出现了“以古文为时文”的趋向。其中“唐宋派”对八股文和策论的影响最大。“唐宋派”是在前后七子之间兴起的一个文学流派,以唐顺之、归有光、茅坤等为代表,他们以唐宋古文相号召,尤其推崇唐宋八大家。唐顺之、归有光、茅坤等又是公认的八股文大家,他们将古文笔法融入八股文和策论,“以八家之法为功令文”〔30〕。不仅如此,他们还通过编选和评点古文来宣传自己的主张,这些图书实际上也是很好的八股文或策论范文,也都因此成为当时重要的科举考试用书,如归有光用五色笔圈点《史记》标示文章之命脉筋节,使初学者有法度可循,其书遂被士子奉为时文秘诀。茅坤编纂的《唐宋八大家文抄》“以其文有法度之可求,于场屋之取用甚便”〔31〕,因此深得应试者青睐,以至于“其书

盛行,海内乡里小生无不知茅鹿门者”〔32〕。

除了前代大家的文集外,时人特别是一些时文大家的文集也颇得士子青睐,而且这些文集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时文和策论。但是由于当时这类书非常之多,而且有些很难确定是否主要为科举考试而刊刻,故本文不作论述。

明代,尤其是中后期,关于作文技法和应试技巧类的图书也特别多,既有专门论述八股文技法甚至是五经中的某一经的八股文写作的图书,也有专门论述二三场特别是其中的策论、表、判的写作技法的图书,还有的是综合性的类书,其中也包括考试范文。①

袁黄的《游艺塾文规》、《游艺塾续文规》分类辑录了八股文的理论、写作技巧和形式。冯梦龙的《麟经指月》“示人以《春秋》八股文之作法也。其所示范,仅限破题。如‘元年’、‘家父聘’云:‘《春秋》纪元、责相,而人君之职明矣’;‘盟蔑’、‘战郎’云:‘《春秋》讥兵好,以其皆非出于不得已也。’知明代经义盖都用搭截题,而冯君专治《春秋》,故有斯作。”〔33〕除了《麟经指月》外,冯梦龙编纂的《春秋衡库》、《四书指月》也都是讲解八股文技法的举业用书。

三、科举考试用书的编辑组稿和宣传策略

明中后期,随着科举用书的种类日趋繁多和刻书主体的多元化,组稿方式也日益多元化,但是直到隆庆年间,书坊刻书还主要是书商自己直接选编,如《戒庵老人漫笔》记载的书商就是自己亲自操笔,“抄得灯窗下课数十篇”。

万历以后,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由书商亲自选编的方式已经行不通了,他们开始聘请名人来选编文章,再到后来,还请著名文人点评。状元、会元

①举其要者如下:

归有光批释:《新刊批释举业切要古今文则》,隆庆六年吴县书林郑子明刊。

沈一贯辑:《新刻沈相国续选百家举业奇珍》四卷,万历金陵书林周日校万卷楼刊。

武之望编:《新刻举业厄言》(又名《官板举业厄言》)五卷,万历二十七年金陵书林周日校万卷楼刊。

李叔元辑:《新楔诸名家前后场元部肄业精诀》四卷,万历三十二年建阳书林陈世璜存德堂刊。

李廷机评释:《新镌翰林评选注释二场表学司南》四卷,万历二十三年建邑书林余良史刊。

余有丁辑:《新刊补遗标题论策指南纲鉴纂要》二十卷,万历二十七年建阳书林余良木自新高刊。

施凤来辑:《新刻施太史举业古今摘粹玉圃龙渊》,万历书林刘朝爵合志斋刊。

邵景尧评选、卢效祖辑:《新刊邵翰林评选举业捷学宇宙光芒》十二卷,万历二十七年羊城书林周时泰博古堂刊。

邵景尧评选、卢效祖辑:《新刻邵太史评释举业古今摘粹玉圃珠渊》十卷,明万历周时泰博古堂刻本。

李廷机辑、吴龙征注释:《新刊名儒举业分类注释百子粹言》六卷,万历金陵书林叶贵近山堂刊。

袁黄辑:《游艺塾文规》、《游艺塾续文规》前者是万历三十年建阳书林叶仰山刊刻,后者刊刻年代不详。

冯梦龙撰:《麟经指月》十二卷,已知的有万历四十八年麻城刻本和泰昌元年吴县书林开美堂、崇祯八年书林叶昆池能远居苏州刻本三个刻本。

费宏:《费状元锦囊试问》二卷,具体刊刻年代不详。



以及翰林院官员都是科场上的佼佼者,因此更成为书商争夺的作者资源,如李廷机是万历十一年会元、榜眼,累官至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汤宾尹是万历二十三年会元,曾任翰林院编修,二人是当时非常难得的作者资源,书坊刊刻了大量他们编选的科举用书,当然其中不乏书商冒用他们名字者。李廷机编选的举业用书有《新刻翰林评选注释程策会要》、《新镌翰林评选注释二场表学司南》、《新刊名儒举业分类注释百子粹言》、《新镌十翰林评选注释名家程墨策纂二卷论纂二卷》、《新镌李相国九我先生评选苏文汇精》、《新镌会元纂着句意句训易经翰林家说》等,这些书都是书坊所刻。从笔者所见到的各种书目看,万历年间,以某会元、状元或翰林之名选编或评点注释的举业用书有近百种。

天启、崇祯年间,民间的时文选家影响日益增大,特别是文社的加入更使组稿方式呈现出新的特点,文社和书商开始有组织地进行科举用书的编选和出版活动,而且有一定的连续性和计划性,《国表》和《几社会义》的连续刊行就是这种特点的反映。前面所讲的社选、征选、房选、小选、合选等时文编选方式实际上也是组稿方式,反映了编选和出版的有组织性。这一时期,书商和作者的联系更加紧密,互利性也更加增强,书商从科举用书的发行中获得了巨额的利润,作者也从书商那里获得了非常可观的稿酬。作为复社领袖之一的吴应箕在谈及编选《崇祯丁丑房牍》的缘由时说:“金阊书林迎予千里,予于是入天都,下钱塘,溯苕禾,至虎丘而休焉!文自京刻为各经师所已选者五千余首,合之行藏诸刻又万余首,……谬论以意择之得佳者八百余首,书既成,例序之。”^[34]书商之所以千里迢迢来南京,吴应箕之所以应书商之邀从南京不远千里到达虎丘,说明双方皆有利可图。实际上,复社的活动经费很大一部分就是出自为书商编选时文所获得的稿酬。明末,复社在当时士人中有很大的影响,特别是复社成员科举通过率特别高,复社编选的时文因此受到士子的欢迎,通过书商源源不断地销售到全国各地,书商和复社也都因此获取了巨大的财富。

明中后期,书坊的市场意识明显增强,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各书坊都非常注重图书的宣传。由于“书坊非举业不刊,市肆非举业不售”,因此与其他类型的图书相比,科举考试用书的市场竞争尤其激烈,书坊也就更加注重此类图书的宣传。宣传的方式五花八门,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种:

(1)通过书名做宣传。任何读者购书首先要

看书名,如果书名起得好,不仅能够恰当地概括书的内容和特点,而且能够用最短的时间抓住读者眼球,从而起到广告宣传效果。明代书坊主深刻地认识到了书名的重要性,纷纷在书名上大做文章,前面所列举的书名中的“奇珍”、“粹言”、“玉圃珠渊”、“冠玉”、“玉圃龙渊”、“司南”、“精诀”、“卮言”,这些辞藻或强调所刻之书内容新颖奇特,或强调是举业的精粹,或强调具有指南和诀窍的性质,暗示读者如果购得阅读此书便可出奇制胜,顺利通过科举考试;另外,像上述《新刻翰林评选……》、《新镌十翰林评选……》、《新刻杨会元……》、《新刻邵太史评……》、《新刻沈相国续选……》、《费状元锦囊试问》,诸如此类的图书在当时特别多,这说明当时的书商非常了解读者崇拜名人特别是翰林、会元、状元的心理,通过书名利用“名人效应”促进图书的销售,这实际上也是为自己刊刻的图书做广告。

(2)利用封面或扉页做广告。明代很多书的扉页上都有“题识”,旨在向读者简要介绍该书的信息,很多“题识”实际上就是广告,如建阳书商叶仰山在其所刻的《游艺塾文规》一书的题识是:“了凡先生旧有《谈文录》、《举业彀率》及《心鹄》等书,刊布海内,久为艺林所传诵。近杜门教子,复将新科墨卷自破而承而小,谓大讲,分类评定,如何而元,如何而魁,如何中式,一(目)了然。凡前所评过者,一字不载,买者须认叶仰山原版。”^[35]在杨廷枢、钱禧编辑评点的《皇明历朝四书程墨同文录》中,书商在封二上题有“是选评论极精,搜罗极广,剞劂极工,此昭代不朽之书,非时文比,识者鉴之”等语,标榜此书不仅内容精致丰富,而且雕刻精美。崇祯八年,书商叶昆池在他刊刻的《麟经指月》扉页“题识”中称冯梦龙“经稿久传海内,兹书则帐中秘也,……在本坊如获拱璧,愿海内共宝夜光”^[36]。

(3)请名家点评或作序。明代书坊刊刻的很多举业用书,除了邀请名家编选外,还请名家点评或作序,其目的也是借助名家的“名人效应”促进图书的销售。上面所列举的很多图书都是由名家评点的。明代中后期出版的时文选集绝大多数都有名家撰写的序,当然其中也不乏冒用名人名字作序者。

四、明代科举考试用书出版的影响

明朝科举考试用书出版的繁荣既是明代整个出版业发展和科举制度鼎盛的产物,同时又反过来



影响了当时的科举考试和出版业。不仅如此,它对明中后期的思想文化也产生了很大影响。科举考试用书出版对科举考试的影响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它对科举考试的判卷和录取工作产生了很大影响。明朝中后期,书坊是科举考试用书出版的主体,绝大多数科举考试用书的刊刻都是以赢利为目的,是纯粹的商业行为,同时由于许多有影响的人文及文人社团加入作者和编辑队伍,这种商业行为又深刻影响甚至有时左右了当时科举考试的出题方向和判卷录取工作,以致明末形成了“文统在下”和“行稿社义与程墨争道而驰”的现象。^[37]

明前期,考官对科举考试特别是阅卷录取工作有着绝对的主导权,“文章之权在上”,官刻的程墨体现着“文统”,对读书人起着引领作用,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嘉靖年间。但是,隆庆、万历以后,文章评判的标准开始出现多元化趋势。隆庆二年,李春芳担任会试主考官,他所作的程文不但以王学解经,而且明显地以《庄子》之言入文,这在以前是绝对不可想象的,顾炎武认为“自此五十年间,举业所用,无非释、老之书”^[38]。顾氏之言虽然有所夸张,但也反映了隆庆、万历年间文章评判标准的多元化,说明程朱理学的统治地位受到挑战,这种挑战固然来自王学,但与当时科举考试用书的出版也有一定的关系。应该指出的是,万历年间,虽然科举考试中文章的标准已出现多元化趋势,但并没有打破“文统在上”的局面。到了天启、崇祯年间,情况就截然不同了,这一时期出现了一大批时文选家,各种文社也开始进行有组织的时文编选活动,虽然他们大多是民间或在野的士人,但是在明末意识形态有所松动的情况下,却拥有操控舆论的力量。他们借选编和评点时文来影响当时的科举命题和阅卷录取工作,甚至操纵“选政”,体现在科举类图书上就是很多民间包括文社的八股文选本,其权威性已经超过了程墨。时人曾异撰就曾坦言自己“平生不喜读墨义”,并对人说“昔之程墨掩时义,今之时义敢于侮程墨”^[39]。徐世溥也指出,明末由于有司“取舍失当,是非纒繆,主者之尺度不足以厌服天下,于是文章之权始在下”^[40]。明末以艾南英和复社领袖张溥等为代表的民间选家就受到书坊和士子的青睐,对当时的科举考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有时考官在阅卷时也不得不屈从他们的标准。他们操控“选政”的例子很多,例如复社就通过评选时文左右当时的舆论,使其很多成员得

以顺利通过乡试和会试,不仅如此,据说张溥还能决定考生的等级,“春秋两闱,天子徒然分遣座主,而孰元孰魁,孰先孰后,庶常(指张溥——引者注)已编定无遗人矣”^[41]。张溥的名声因此享誉全国,以致“为弟子者争欲入社,为父兄者亦莫不乐其子弟入社”^[42]。“一时奔竞者多归之,门生有七千人焉”^[43]。

第二,大量科举考试范文和应试技巧类图书的出版使士子们不再去潜心研读四书五经,而是靠背诵范文和揣摩出题方向应付考试,更有甚者在考试时直接抄袭范文。明末著名的思想家李贽就是通过背诵坊刻时文中举的,他坦言自己“读传注不省,不能契朱夫子深心”,实际上是厌恶程朱理学,于是他“取时文尖新可爱玩者,日诵数篇,临场得五百。题旨下,但作缮写眷录生”,结果顺利通过乡试。^[44]万历二十三年,福建晋江人赖克俊在会试时“前场七艺,尽录坊刻,自破、承直到结题,不易一字”^[45]。结果却中进士,一时间,舆论哗然。

以上两个方面是科举考试用书出版的消极影响,但是科举考试用书的出版是一把双刃剑,他的积极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它对于当时的思想文化也产生了很大影响,而且是积极的影响。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它瓦解了以程朱理学为主导的意识形态,促进了思想的多元化和彼此的融合;“崇尚新奇”、追求“险僻奇怪”和以禅释经虽然不免有割裂经义之弊,但却符合文学的审美情趣。正是由于此,明中后期的启蒙思想家李贽将时文与《西厢记》、《水浒传》并誉为“古今至文”^[46],认为时文不仅“可以取士”,而且“可以行远”^[47]。袁宏道认为,时文就应当求新求变,他说:“举业之用,在乎得雋,不时则不雋,不穷新而极变则不时,是故虽三令五督,而文之趋不可止也,时为之也。”^[48]李贽、袁宏道等都是当时很有影响的进步的思想家和文学家,他们对时文的肯定也说明了明中后期八股文的衍变尤其是坊刻在思想史和文学史上的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 [1]郑振铎:《西谛书话》北京:三联书店,1983年,第387页。
- [2]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续稿》卷42《苏长公外纪序》,万历刻本。
- [3]陈绍英编选:《苏长公文燧》卷首,明崇祯刻本。
- [4]顾炎武:《日知录》卷16《拟题》,长沙:岳麓书社,1994年,第590页。
- [5]郎瑛:《七修类稿》卷24《辩证类·时文石刻图书起》,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
- [6][7]《山西通志》(雍正朝)卷134《人物·赵仲辉传》文渊



阁四库全书本。

〔8〕谢铎:《奏修明教化事》黄训编《名臣经济录》卷 26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9〕黄佐:《南雍志》卷 4《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 749 册,第 170 页。

〔10〕《明武宗实录》卷 132 正德十年十二月乙亥。

〔11〕廖道南:《殿阁词林记》卷 14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2〕李廉:《纸说》黄宗羲:《明文海》卷 105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3〕〔29〕王祖嫡:《师竹堂集》卷 22《明郡学生陈惟功墓志铭》明天启刻本。

〔14〕阮葵生:《茶余客话》卷 16 清乾隆刻本。

〔15〕丘濬:《重编琼台稿》卷 9《皇明历科会试序录》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6〕邓显麟:《梦虹奏议》卷下《条陈科举疏》清光绪刻本。

〔17〕顾炎武:《日知录》卷 16《程文》长沙:岳麓书社,1994 年,第 595 页。

〔18〕黄宗羲:《黄宗羲全集》第 10 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 年,第 43 页。

〔19〕倪会鼎:《倪文正公年谱》卷 1 (万历)三十七年己酉,清道光光绪间粤雅堂丛书本。

〔20〕〔22〕〔23〕陆世仪:《复社纪略》卷 1 清抄本。

〔21〕张廷玉等:《明史》卷 277《金声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 年,第 23 册,第 7090 页。

〔24〕杜登春:《社事始末》清昭代丛书道光本,第 5 页。

〔25〕陆世仪:《复社纪略》卷 2 清抄本。

〔26〕顾炎武:《日知录集释》卷 16 长沙:岳麓书社,1994 年,第 584 页。

〔27〕李诩:《戒庵漫笔》卷 8《时艺坊刻》北京:中华书局,1982 年,第 334 页。

〔28〕徐元懋:《古今印史》明刻本。

〔30〕蒋湘南:《七经楼文抄》卷 4《与田叔子论文书》清道光刻本。

〔31〕吴应箕:《楼山堂集》卷 17《八大家文选序》明崇祯十二年刻本。

〔32〕张廷玉等:《明史》卷 287《茅坤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 年,第 24 册,第 7375 页。

〔33〕印永清辑:《顾颉刚书话》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 年,第 173 页。

〔34〕吴应箕:《楼山堂集》卷 17《崇祯丁丑房牒序》明崇祯十二年刻本。

〔35〕袁黄:《游艺塾文规》扉页,《续修四库全书》第 1718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年。

〔36〕冯梦龙:《麟经指月》叶昆池“识语”,崇祯八年叶昆池刻本。

〔37〕〔39〕曾异:《叙庚午程墨质》黄宗羲编:《明文海》卷 309 北京:中华书局,1987 年,第 3 册,第 3192^a 3192^a 页。

〔38〕顾炎武:《日知录》卷 18《破题用庄子》长沙:岳麓书社,1994 年,第 660 页。

〔40〕徐世溥:《同人合编序》黄宗羲编:《明文海》卷 313 北京:中华书局,1987 年,第 3 册,第 3230 页。

〔41〕〔43〕周同谷:《霜猿集》上,清抄本。

〔42〕陆世仪:《复社纪略》卷 2 清抄本。

〔44〕李贽:《焚书》卷 3《卓吾论略》长沙:岳麓书社,1990 年,第 84 页。

〔45〕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 16《录旧文》北京:中华书局,1997 年,第 424 页。

〔46〕李贽:《焚书》卷 3《童心说》长沙:岳麓书社,1990 年,第 98 页。

〔47〕李贽:《焚书》卷 3《时文后序》长沙:岳麓书社,1990 年,第 116 页。

〔48〕袁宏道:《袁宏道集笺校》卷 18《时文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年,第 703 页。

【责任编辑:陈志刚】